

世界高等教育的探讨

[南斯拉夫]德拉高尔朱布·纳伊曼 著

令 华 严 南 德 译

教育科学出版社

世界高等教育的探讨

〔南斯拉夫〕

德拉高尔朱布·纳伊曼 著

令 华 严南德 译

教育科学出版社

一九八二年·北京

内 容 提 要

作者是南斯拉夫共产党人，曾任南斯拉夫文教委员会委员，现在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外联助理总干事。

作者多年来一直从事教育研究，曾对欧洲、美洲、非洲的高等教育进行过广泛的考察和研究。本书从高等教育的历史和现状出发，着眼于社会的未来发展，提出了高等教育存在的问题和若干改革的设想。近年来，他的一些观点和主张已为欧美及第三世界一些国家所采纳并加以实行。全书分为八章。作者旁征博引，论述了他的教育思想，这对于开扩我们的思想，了解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历史和趋势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2106/07

世界高等教育的探讨

〔南斯拉夫〕

德拉高尔朱布·纳伊曼 著

令 华 严南德 译

•

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顺义燕华营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毫米1/32 印张5.875 字数129,000

1982年4月第1版 1982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500册

书号：7232·118 定价：0.60元

译者说明

本书作者德拉高尔朱布·纳伊曼，南斯拉夫人，一九三二年生于塞尔维亚。一九四八年加入南斯拉夫共产党。曾任南斯拉夫文教委员会委员，负责青年团中央对外联络工作并任“青年生活”主编。一九五七年至一九七五年进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秘书处，曾任教育部门高等教育及培训司司长。一九七五年后任外联助理总干事，总管该组织的全部技术援助计划。

纳伊曼多年研究教育问题，近年来更潜心于高等教育，成为当代欧洲国家在这方面的知名学者。他不只在学术观点上有一些独到之处，而且致力于教育改革活动，又成为有声望的社会活动家。纳伊曼一九八〇年曾应邀来我国进行友好访问。

纳伊曼有教育专著多种，其中主要有《非洲教育发展方向》、《世界高等教育的探讨》、《世界和南斯拉夫的教育改革》、《世界发展问题》等。

《世界高等教育的探讨》一书是纳伊曼在高等教育方面具有独到见解的一本代表作。作者从高等教育的历史和现状出发，引用许多学者、专家的不同观点和大量资料，论述了高等教育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高等教育的职能和任务、现代科学技术革命对高等教育的影响、高等学校教学和科研的关系、高等教育结构的多样化、现代教育技术在高等教育中的应用、高等教育发展中数量和质量的的关系、加强高

等教育和社会生产实际的结合等重大问题，探讨了高等教育的未来发展前景。这对于开扩我们的思路，使我们了解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历史和趋势，是有参考价值的。当然，这些观点和主张，大都是针对欧美当时的情况提出的。有些看法，我国读者自然会作出自己的评价。

本书在写作风格上间以自述和旁述的手法。译者力求保持原著风格，但限于语言水平和修养，译文难免有艰涩之处，这是译者要致歉意的。

本书已有多种文字译本。纳伊曼先生为本书中译本的出版专门撰写了出版前言，对我国读者表达了热情的希望，我们在此谨向作者表示感谢。

译 者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

中文译本出版前言

对于一名作者来说，当他的著作刚刚出版就要被译成另一种语言的时候，他是非常激动的。如果这本书不是马上，而是在原文出版了好几年之后才被译成中文，他就会更加激动。因为，这首先说明作者曾经付出辛劳的著作没有被忘记，人们一直读着这本书，并且乐意继续从中寻求着某种启发。正因为如此，作为本书的作者，我是非常激动和愉快的。可是，作者同时也感到很不安。因为他要重新考虑这本书的内容是否还合适，是否陈旧。最后，作者本人经过这么多年后，是否还保持这本书的观点。

一开始我应该对读者说明，当得知这本书的中译本将要出版时，我表现出了极大的喜悦。在一九七四年出版本书时，我就充满了信心，直到现在我的这种信心也没有任何动摇。不是我不懂得批评和自我批评的重要性，也不是我不谦虚。如果是我今天来写这本书，我仍将一行字也不改动。当然，这种看法并不一定要使所有的人都满意。我之所以有这种看法，是因为书中所提出的问题大部分仍然没有克服，没有采取解决措施和应该提倡的方向。

中国读者在阅读本书时会很快地发现：这本书的写作目的不是为了求得息事宁人。然而我确信，中国读者能够理解书中有时用的一些惹人恼火的语言不是有意寻衅，而是为了提请人们注意到这种迫切的必要性，即动摇前所接受的大量固有的思想的必要性。从而应该立即丢掉错误思想，把有保

留价值的思想重新组织成一个新的整体。

我希望中国读者在这本书中将会找到某些有用的观点，即使他们不全部同意这些观点，我想它也会有助于人们思考高等教育应该是什么样的，人们应该做些什么，能够做些什么。

我关心中国读者能否特别注意到我的这样一种深深的信念：如果人们不具备足够数量的干部，而这些干部在科学和业务能力上又具有无可争议的高水平的话，想要发展社会和经济是没有任何可能的。我希望人们能正确地理解我。我认为，这是一个真理，而且无论处在什么意识形态和什么样的环境条件下，这都是无可置疑的事实。如果没有高水平的干部，这个国家就象一个没有栋梁的房子，它就不能继续发展。人们会懂得，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为什么把那些称之为“冒牌理论”的东西看作是非现实主义的，甚至是反动的。因为这些理论从来没有被充分证实过。这些理论主张对高等教育在数量上限制，由此我肯定它必然会带来在质量上的限制。

我同样也希望读者不要从上面一段中得出以下结论：作者主张把知识和权力混淆起来；或者换一种说法，作者主张由大学毕业生来取得政权。完全相反，我认为一张大学毕业论文永远不应该、绝对不应该被看作是取得权力职务的一种直接途径。大学毕业后，也不应该就一定保证能得到大大小小的官职。当然，即使这种现象在某些情况下不可能避免，但是，那也是因为有其它个人条件，比如能力等所决定的，这样理解才对。

从前面这个论点能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那就是大学教育应该这样来设想——这里所涉及的是高等教育规划的一般问题——高等教育不是为培养官员，而是要培养有用的人，

培养那些在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现在或将来可以使用的
人。原先简单地把大学当作一成不变的“培养官员的机器”，
而现在这就要求它有更丰富的预见性和想象力。有许多例子
表明，不这样做就可能是一种自杀。这是由于两方面的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产生了过量的不合格的有职权的官员；第二
个原因是，在某些急需的职业方面培养的合格人才在数量
上不足（比如：技术、经营管理，分析和教育等）。

我不想在前言中重复整本书的内容。然而我要再次提醒
读者注意另外一个重要的信念：高等教育如同整个教育过程
一样，应该同某些传统的观念和模式决裂。这些观念和模式
曾经起过一定的作用。但是，现在已成为有害的了。还如同
整个教育过程一样，高等教育也不应该采取这样的形式：围绕
在“一位大权威”的周围对少数学生进行口头传授的教学方
式，而不管其教学效果的好坏。反之，应该采取与之不同的
其它方式。这个“神圣的圈子”应该以多种方式打破：学生
应该能够从这中间走出来，非教学人员应该能够走进这个“圈
子”里去，以便带进非学术性的现实生活的内容。在这种情
况下，我们怎么能够不去使用今后可以使用的多种多样的新
技术呢？怎么能够不看到电子计算机的应用能够改变，而且
一定会改变在教员和学生之间关系的表现，甚至是关系的性
质呢？

我还要向中国读者提出最后一个对我的宽待，就是请你们
告诉我对这本书的意见、批评及反映。我承认对中国的实际
情况没有深刻的了解，所以中国读者的批评对我将是有益的，
在此，我提前谨致谢意。

德拉高尔朱布·纳伊曼

一九八一年七月一日于巴黎

目 录

引 言	(1)
第一章 高等教育面临的问题	(18)
第二章 科学技术革命和高等教育	(45)
第三章 人口、学生数字增长的压力及其后果	(66)
第四章 普通教育还是职业教育	(96)
第五章 教育技术	(115)
第六章 教师, 还是研究人员	(128)
第七章 一种极富有吸引力的提法: 多样化·····	(146)
第八章 高等教育和社会	(162)

引 言

一九七二年，我在一本论述非洲教育的著作中已花费了，一整章篇幅谈论高等教育问题。在研究非洲大陆教育制度发展的状况及前景的同时，我已经确信，体制掌管高等教育的全局。如果体制不改变的话，高等教育不可能有所变化。

正是在这个时期，我产生了写一部关于这个问题和大学问题的专著想法。但是，这个问题是以世界为背景的。因为大学这一现象是超越民族、超越地区和超越文化传统的。大学是依照中世纪欧洲存在的模式发展起来的。当教学和教育的其它形式逐渐地具备民族或地区的特点时，世界各地的高等教育实际上仍然停留在相同的状况下。高等教育这种无变化的持续局面很可能是由于受到几乎世界性危机影响的缘故。在人类活动的其它任何领域内，可能除了在空中联系方面之外，实际上没有任何活动在世界某一地区开始以后，能够在世界所有其他地区基本上以相同的形式发展。这个理由很简单：在大多数情况下，同样的原因导致了同样的结果。高等教育在几乎所有国家同时进入危机，而在这种危机不明显的地方，也不等于说危机不潜伏存在着。

我们从一本探讨在世界各个角落发生这种问题的著作中得到了一种概括的结论。这种概括结论肯定有积极的方面，也就是能指出主要倾向以及具有解决不同情况下的各种问题的可能性。但是它也面临这样一种不足，即不论是在评论中还是在所提供的解决办法中，都会显露出整个推论所固

有的缺点。

我希望人们理解我：我的愿望丝毫不是在细节上描写世界各国高等教育的进展情况，也不是研究存在于五大洲之众多大学的组织机构，更不是想对所有这些制度进行一个比较或评论。我的目标是极其微小的。

从世界高等教育现状出发，我想探索出高等教育发展的主要趋向在工业化之后，这个技术化的社会正处于人类向科学革命迈进之中。从这个分析出发，着重确定未来高等教育的组成部分。同时，我试图分析高等教育应该提供给这个社会的“最后成品”的特点。

此种展望打算这样进行，一方面分析教学人员的职责与作用，另一方面试图找出未来的大学生们可能进入这些学校里所应具备的条件。最后我想提出与高等学校的作用、管理和财政相关的各种问题，当然也不因此就忽视在高等学校里应该使用的教学法和教学章程。

在一九六七年末“高等教育曾被规定为包括所有的教育（传统教育、职业教育、技术教育、师范教育），在一些大学、大学预科、工学院和高等师范学校里进行以上各类教育。进入这些学校必须是在结束中学学业之后，入学年龄一般在十八岁左右，这些学校里学生的学习成绩最后表现为由一个学位、证书或高级学习文凭所认可。”

几年过去了，对这项规定的整个内容提出了新的问题。因为，高等教育难道只能上面限定的学校里进行吗？我们是否永远应该认为只有中学毕业才能进入大学呢？入大学的年龄是否必须在十八岁左右呢？最后提出的问题是，这样的高等教育可能得到什么样的必然结果呢？从这些疑问就引出另一个问题，我觉得最好在这本书的开始提出它来，就是设在

这种情况下是否应该简单地取消大学，甚至于取消这样的高等教育？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我愿意尽可能清楚地表明自己的观点。我并不反对取消象目前这样到处存在的一些大学，并且我将试着说明其理由。但是我要急于补充说明的是，我不属于那些认为高等教育无用的人。这本书的主要目标恰恰是要指出：在一场教育改革中，高等教育所占位置的重要性是无可争议的。然而，这是属于一种未来社会所需要的教育学，与今天的教育学可能是非常不同的。“大学生们的行动在教育的保守主义墙上打开了一个重要缺口”不是偶然的。

对此，不能以偶然性作任何解释，因为大学生年纪轻，并且各式各样的极端主义从来就是青年人的特点。同时应该了解的是目前存在的高等教育使一些达到成人年龄、通常是二十五岁甚至到二十七岁的年轻人，在称为大学的禁区里度过他们的时光。在那里，他们不参与任何社会生活，而只是观察、评论和判断着社会生活。因为没有任何机构象今天的大学那样从社会上孤立出来。而且除了大学生和教授们外，很少有人尽管不参加社会活动而能对大学提出批评意见。比如，“法国一九六八年冬季发生了对于‘大学城’法规的第一次反抗行动。之后，就对大学法规提出争议，紧接着对社会乃至对国家政治提出异议”〔1〕就是这样发生的。在其它地方，大学生们主要的要求是关于“高等教育的改革问题和国语扫盲的实施”等等〔2〕。

关于教育制度最使人惊讶的，就是在已经了解了很多关

〔1〕 让·朱塞林《世界青年的不满》联合国教科文出版社，1972。

〔2〕 同上。

于问题、僵局（目前的和将来的）和可能的解决办法的情况下，而我们却什么也不做，好象所有的人在行动前甘心等待一次危机。这正如戴高乐将军所说大学危机的引起是“由于这些庞大团体对适应国家的现代需要及适应青年们就业和作用方面表现的软弱无力造成的。”（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五日的演说）。

尽管从一九六八年起将要发生事件的预兆已有所显露，但是，事件的来势之猛，大学生们的激进态度及学术界对青年们的要求不准备给予答复，使整个世界为之震惊。所以应该赶快行动，并且要经常趁热打铁。就因为这个原因，从这一时期开始了许多改革，但这仅仅是权宜之计。通过权宜之计，学术当局和政府只是试图阻止请愿的浪潮，而没有实际解决任何一个根本问题。不管我们把目光转向哪一方面，我们到处看见的是同一景象，如同“在每个国家主要学区中心里的大学生中出现了严重骚乱，从由此煽动起来的紧张与冲突中觉悟到应该不惜任何代价以建设性的方式加以解决”〔3〕，这样才与世界各国实际相符合。应该赶快做，“在巴黎、巴塞罗那和华沙，刚一发生大学生骚乱，各自的政府就在他们的国家里颁布了改革高等教育的结构和作用的重要文件”〔4〕。但是存在着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这些改革原应是各种社会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秩序的改革的结果。但是，在几个世纪期间，各种社会对大学教育没有发生任何影响，而是大学生的运动和骚乱发起了这些改革。可惜，那些为事情的这种状态而高兴的人们可能很快失望，因为学生运动刚一停止，人们

〔3〕 约瑟夫·D·博纳：《学生行为主义、学生参予管理和机构改革的关系：五个案例研究》，联合国教科文出版社，1970。

〔4〕 同上。

不仅停止了为深刻改革高等教育所必须进行的严肃的研究工作，而且“在几个月中，大学过多地占据人们的思想，以至人们为看到大学从公众和当权者的忧虑中消除而感到高兴。”

（世界报，一九七二年七月四日—五日）。

无可怀疑，在高等教育的改革方面，目前我们正处在低潮时期。尽管在世界各地出现了并还正在出现大量的个人行动（在这里我将着重述及它们），总的来说，一九六八年开始的大规模的运动，目前几乎在各国都有所收敛。这种状态的结果不是人们所期待的。人们已经能够觉察青年们对大学问题有所淡漠。当前，仅仅在某些最发达国家，如美国，这种现象是明显的。但毫无疑问，如果不采取根本措施，在一定的時候，它将涉及到其它不甚发达国家。假如只在今天的大学机构中寻找青年们淡漠的原因，显然是荒谬的。这样做过分地看重了大学的重要性，而忽视了一系列社会和经济方面的其它因素。

我研究的目的是分析这种不满的所有现象。然而我想事先指出，青年们比过去可能更加急于进入现实生活，而且也指出，他们懂得大学对于他们进入社会延误了几年。还必须提及，先前的制度、特别是中等教育制度，世界各地都使青年们一般感到厌倦学习，尤其是冗长的大学课程更是这样。最后，一些人断言，青年们中学毕业后拒绝进入大学，是因为他们不愿再致力于要求巨大努力而结果又令人失望的脑力劳动。

学生们的抗议与请愿运动完全如同过去的高等教育中进行的某些改革，人们可能给自己提出一个问题：现在期待更彻底的变化理由是什么？的确在表面上，事情好象以一种绝对满意的方式进行。这仅仅是表面的，因为人们只要多看

一眼事实，特别是数字，每个观察者都能发现大量的问题。因为“人口的增长和中学生人数的增长同时给限制性很大的和只培养少数尖子的旧教育机构增加了压力”〔5〕。甚至一些关心高等教育情况细心的观察家们也不怀疑问题的严重性，但是却认为其恶果在相当遥远的未来才会出现。“通过公开的或隐蔽的选择手段，努力缩小大学的入学门路，这是忘记了超发展社会要求其所有成员要有较高的文化水平。五十年前，人们努力普及的小学毕业程度是最低文化水平。今天，逐渐要求人们具有中学毕业会考证书的水平。明天，可能要求学士学位或高等教育第一阶段文凭。即使这样的一个文化水平，对于从事某些职业，如熟练工人、农业工人、商店职员等从技术上讲不是必不可少的；但对希望晋升的人或简单地说对于正式公民和有正式职业的人，将感到这样一种文化水平在社会上是必要的”〔6〕。

这种说法尽管是严肃和合乎情理的，然而低估了时间因素。当人们谈到不发达社会时，不是关系到明天，而是要解决今天的问题。几项数字使我充实了这种看法：一九五〇年，全世界有三千八百多万中学生由将近二百万教师任教。同一时期，在高等学校里有六百三十多万大学生及五十六万四千名教师授课。一九七〇年的最新统计，高等学校中有二千六百多万大学生和二百万左右的教师。再深入研究一下这些数据时，结论使人惊愕。在二十年间高等学校教师数目达到中等学校教师的数目了。并且在二十五年的时间里，也就是在

〔5〕 同〔3〕。

〔6〕 莫里斯·迪韦尔热：《大学的目标》，巴黎，1972.10.21《世界各地》。

一九七五年，将有三千八百万左右大学生，也就是说如同人们计算的，正好相当于二十五年前全世界中等教育人数的总和。

根据统计年鉴，对某些国家的数字粗略过目便能使我们更好地估计问题的程度。这样，在以色列，一九六〇年有六万七千名中学生；一九六九年有五万名大学生，十年间，大学生人数增加了二倍多。

菲律宾的数字更引人注目：在一九六〇年，有六十六万名中学生和二十七万一千名大学生，在一九六八年人们已统计有六十二万七千名大学生，这就是说高等学校大学生的数目已达到距今仅仅八年前的中学生人数了。

在阿尔巴尼亚，据统计，一九五〇年大学里有三百零四名学生；一九六〇年，六千七百零三名；一九六九年，二万三千一百八十名。我们明确指出，一九六〇年阿尔巴尼亚有二万五千名中学生。

面对这种普遍与快速的增长，所有国家同处困境。在瑞典也是如此，“在一九五〇至一九七〇年间在大学类型的高等教育机构中注册的人数增加了九倍”〔7〕。一九六〇至一九六九年间，在英国中学生数目最高达到三百五十万左右，而大学生数目在一九六〇年已从二十四万一千八百一十四名增加到一九七九年的五十万零九千五百零一名。再讲两个大的国家的例子：在苏联，大学生数目从一九五〇年一百二十四万七千名增加到一九六〇年的二百三十九万六千名，在一九七〇年最后达到四百五十八万名。这一个数字（包括夜校和函授学校）比十年前在中学里统计的学生数字三百五十

〔7〕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瑞典政府报告》，巴黎，1973。

九万六千名还高出一百万！美国大学生人数从一九六〇年的三百五十八万二千名增加到一九七〇年的八百四十九万八千一百名。补充一下，别忘记一九六〇年美国曾有九百六十万名中学生。

二十年内在世界范围，高等学校中的学生与教师实际上增加了三倍。这些大量的数据使我想到了，不仅重新认真考虑组织和结构，内容和方法的时刻到来了，而且要全面研究高等教育的目标和作用了。

对于过去为培养少数尖子所设计的学府，应该对想进入它大门的人数日益增多的青年和成人开放。而对大众化的高等教育，高等学府能否保留着自从它创建以来实际上没有改变的过去的特点？依我看，我们正处于一种典型的情况面前。从某些已观察到的现象可知，数量的增加即将引起质量的深刻变化。整个教育体系处于社会和政府的批评之下，不管愿意与否，高等教育是其中的一部分，而政府和社会认为他们支付的经费数目越来越大，而收效越来越不能令人满意。

在失败的证明面前，政治家和教育家之间好象头一次正在达成一项协议。尽管某些辩护者认为教育制度从来没有满足人们所提出的要求，但就我这方面而言，我认为目前情况比先前的社会所经历的情况更严重。我惊讶教育界所发生的浪费竟没有受到过更多的批评，并且，有一天很可能在一个发达国家中，一位教育界的拉尔夫·纳德[Ralph Nader]将会发动一场真正的、深远的教育制度的改革及合理化运动，对此我不会感到惊奇。作为消费者们，无论是家长、中学生还是大学生，都期待着一位能代表他们对世界各地教育方面所做的一切开展一场严厉的批评的人，他将能做出一份根